

当代中国核心价值研究

丛书主编 · 冯 平



三十年 社会与文化思潮

邹诗鹏◎著

2.7
1

 复旦大学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中青院 11 000681013

当代中国核心价值研究

丛书主编 冯 平



三十年 社会与文化思潮

邹诗鹏◎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青院 11 000681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年社会与文化思潮/邹诗鹏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1
(当代中国核心价值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09162-5

I. 三… II. 邹… III. ①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现代②文化思潮-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092.7②K27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7571 号

三十年社会与文化思潮

邹诗鹏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方尚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 字数 89 千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162-5/D·579

定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民族复兴与价值重建

(代总序)

冯 平

当下之中国再一次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自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成为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新中国的建立第一次辉煌地实现了这一梦想。她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受尽欺压凌辱的历史,一个独立和空前统一的中国从此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然而“以1957年为转折点,整个社会就逐渐陷于紧张、痛苦、匮乏、沉默、贫穷以致到最后的‘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①。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结束了平等优先、政治挂帅的“平等主义现代化”规划,坚决放弃了僵硬的阶级斗争为纲方针,特别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首要性,从而走上了发展优先、富裕至上的“发展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再一次复兴。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再次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困难。粗放式增长模式现已达到极限,能源、环境敲响了警钟,地区发展不平衡,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两极化和贪污腐败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核心价值缺失,人心涣散,民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92页。

族和国家认同日渐淡化。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社会大众、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急剧增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再次开始了近于白热化的争论。争论聚焦于对中国现实问题起因的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价值判断,和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探究。这些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分析、判断和见解,与严峻的现实交相呼应,呈现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与解决这些问题的艰巨性。在中国发展的这一历史时刻,我们需要确定中国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位置,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以此反思“发展主义现代化”的偏差,厘清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确立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价值。

我们认为,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这三大张力之中。这三大张力标示出当下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历史坐标,彰显出确立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所面临的三大难题。

首先,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运动与文明复兴运动的张力之中。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首要难题。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在经验层面是否可能有自己的做法,不同的民族国家是否可能有实现现代化的不同方式,而在于:现代化这一历史变迁中是否蕴含着一组普遍价值,是否蕴含着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昭示历史发展趋势的总体特征;一个现代化国家能否既具有现代化的总体特征,又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从而在现代化的全球化过程中,保留一种文化的多样性和提供一种发展的可能性;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否走出下述非此即彼的“误区”:要么是“绝对主义”地强调全球只有西方现代化一种模式,要么是“相对主义”地认定各民族各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可通约的。这是探究中华民族复兴必须考虑的

第一大难题。

其次,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张力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两种筹划,是现代历史中展开的现代性的两个版本。问题在于,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它们各自在现代性中把握到了什么,在其各自的理念和所追求的价值中包含着什么样的理性和解放潜能,它们各自具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在它们的历史展开中又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收获和灾难?这是探究中华民族复兴必须考虑的第二大难题。

第三,当代中国处于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的张力之中。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必然选择,还是特定历史力量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崛起是否包含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行动逻辑的出现?在现代性的话语框架中,是否可能存在一个不同于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样态?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更应是一种种族的、疆域的认同,还是更应是一种共同体生存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这是探究中华民族复兴必须考虑的第三大难题。

上述三大张力及其所产生的三大难题,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当下境况,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要真正掌握中华民族复兴的命运,就必须从本质上把握这三大张力。就其本质而言,这三大张力都是现代性问题的不同呈现样式。三大张力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换言之,三大张力的核心在于现代性,即在于中国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理念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我们以为,只有建立“复杂现代性”理念,克服单一化的现代性理念和有相对主义之嫌的多元现代性理念,才能比较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当下之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弄清楚当代中国需要一套什么样的既立意高远又脚踏实地的核心价值。

“复杂现代性”概念的基本立场,首先是肯定“现代性”的普遍性、共性和相对确定性,其次是强调“现代性”在空间、时间和内在结构上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实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世界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种种历史教训,以及中国现代化过程曾经经历过的切肤之痛,告诫我们只有肯定“现代性”的整体性、普遍性、共性和相对确定性,才能使我们免于堕入相对主义,才能使我们清醒地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把握文明转型的必然性、必要性,并在这一前提下,确定构建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尚未完成的设计”,现代性为各种文化对其原有规范做出新的诠释并生成新的规范提供了可能。人类文明的发展,绝不可能是一种既有且固定的模式的推广。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对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经验教训的汲取和反思,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文化的、在原有传统中可以获得丰厚资源的实现形态,是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复杂现代性”理念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落实了“复杂现代性”的思路,在经济上实现了跨越性的发展,虽然我们很少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社会存在的许多缺陷和问题,恰恰又是由简单现代性思维造成的。如盛行于政府管理和政策导向中的“增长主义”就是如此,它把经济增长看作高于一切,完全不顾社会的复杂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经济、政治、文化是相互依赖的。任何一个方面受到损害,都会妨碍其他目标的实现。有些措施和政策,在某些时候可能是复杂关系的一个纽结,因而是有效的,但在另一时候它可能就成为与其他方面相脱节的简单化做法。中国不论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还是制度的改革上,都需要有“复杂现代性”意识,一方面保持对现

代性规范的内在矛盾和冲突的敏感性,另一方面保持对现代化的经验条件和实践过程的敏感性。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单纯经济总量的增长。国家或民族的尊严不仅取决于 GDP 的世界排名。今日中华民族的复兴,更需要的是一种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建,一种基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以人类文明发展趋势为取向的价值的重建。我们期望通过本套丛书从价值重建的资源、可能性、曾经有过的各种理想、曾经做过的各种尝试、目前所存在的各种困难等各不同维度的探讨,提供我们对中华民族复兴与价值重建这一问题的思考。

引 言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人见证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一个在自身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亘古未见的时代巨变,竟然就在最近的三十年间全面地展现出来。李鸿章曾说近代中国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三十年里,当代中国所经历的其实也是世界现代化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过这三十年的中国人当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幸运儿。

这三十年,承继了中华传统的现当代转化,承继了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华文明面向世界的艰苦卓绝的现代开启过程,承继了新中国的崛起、历史使命及其磨难。当代中国高举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旗,励精图治,革新鼎故,追赶世界文明大势并助益于世界文明的当代重构。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沧桑巨变、成就斐然。三十年,也是人们的思想观念推陈出新、急剧变迁的三十年,是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潮起潮落、相互激荡的三十年。

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国家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以阶段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形成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启动了当代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从过去的“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开始发生全面的转变。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发生在1992年以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及“三个有利于”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破

除了有关“计划”与“市场”以及“姓资”与“姓社”的谜团，而随后全面展开的市场经济进程更是前所未有地促使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全方位的转变。

宏观政治背景为把握时代观念与思潮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三十年来经历的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统领着新时期中国人思想观念及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及演进。从总体上看，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开启并对应于贯穿于80年代的激进的新启蒙思潮，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也推动了新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兴起，由此蔚成当代中国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80年代初渐次形成的人道主义、自由民主诉求、科学主义，至80年代中期的西学化与稍后兴起的寻根文化，接下来是极端的西化派与新权威主义的兴起，至1989年“北京风波”，整个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告一段落。

90年代以来，邓小平南方谈话启动了新时期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应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中国努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引入市场经济的新机制并不断推陈出新，与此同时，社会文化思潮转向分化与多样化。新启蒙思潮或走海外民运路线且渐次分化，或于国内转入理性化、学术化或文化批判路线。市场经济促成了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并且在复杂的国内外氛围影响下，激起了新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形成此后当代中国思潮演进的基本格局。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面临新时期各种国际国内矛盾的呈现及其复杂局面，改革事业进入攻坚时期，整个发展模式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变革与调整，国家在宏观政治层面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整个国家实际上正在经历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事关中国道路的前景及其历史使命，事关更为复杂的国

际国内局面,事关更为深刻的历史逻辑,因而无论在深度还是力度上都不同于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一场迄今仍在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此相应,新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思潮一方面保持了前二十年特别是 90 年代的基本格局,但又呈现出新的态势: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呈持续强化之势,新出现的民生思潮、网络化助推民粹主义走向前台。民主法治潮流更趋明朗,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成为热门话题和研究主题。

目 录

民族复兴与价值重建(代总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80 年代的新启蒙思潮	1
一、人道主义	2
二、“自由民主派”	11
三、科学主义	13
四、“西学热”	15
五、寻根文化热	16
六、新权威主义	18
第二章 90 年代社会文化思潮的分化与多样化	22
一、新启蒙思潮及其转化	24
二、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	28
三、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	32
四、新自由主义	38
五、新左派	42
六、后现代主义及虚无主义	45

第三章 21 世纪以来社会文化思潮的新变化与新动向	51
一、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持续	53
二、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55
三、民生思潮	60
四、“中国模式”引起热议	64
五、民主法治潮	69
六、网络民粹主义	72
第四章 三十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聚合与历史效应	77
一、三十年社会文化思潮演进的连贯性	77
二、三十年社会文化思潮的四个维度	88
三、三十年社会文化思潮的哲学自觉	103
后记	112

第一章

80 年代的新启蒙思潮

从 1978 年至 1989 年,大致可以看成是思想观念的新启蒙时期,也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是 20 世纪“五四”文化精神在当代中国的续写与再现,是在经历十年“文革”浩劫及其极“左”思潮禁锢之后社会文化思潮对启蒙及其人道主义精神的自觉追求。

新启蒙思潮的兴起,当首先得益于邓小平率先引导的面向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中特别得益于 1978 年开展的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构成了随后展开的新启蒙思潮的前奏。这场讨论,虽然本身也属于新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但其历史与政治意义又远远大于新启蒙思潮,因而显然不能只是在新启蒙思潮意义上去理解。哲学理论界对实践标准问题的探讨,究其实乃邓小平有关解放思想、突破“两个凡是”、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在理论探讨上的具体化。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福明已经撰写了有关实践标准问题的文章,文章后经孙长江等人的多次修改,并经胡耀邦的亲自批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以“光明日报

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正式刊出,随后,相关重要刊物及媒体也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被视为当时中国重要的“政治宣言”,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实践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当代中国史上通过理论探讨明确认识进而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范例,本身就是国家及政党层面进行启蒙教育的一个范例,其主旨无疑是形成与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匹配的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标准问题讨论为以后改革开放的实践作了一个理论上的基本定调,对于此后新启蒙思潮的兴起,起到了思想政治层面的保障作用。

新启蒙思潮的背景,除了同当时政治思想上解放思想、突破“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主导方针不谋而合外,尚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十年“文革”浩劫及其人道主义灾难的人性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反思;二是社会发展,改变国家尤其是农村贫困落后现状的现实要求;三是在新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困惑、迷惘与思考;四是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心理结构的深层挖掘。

依其表现及其演进,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可分为如下六个方面。

一、人道主义

80年代初兴起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潮,表现在文学艺术、哲学以及现实生活等各个领域。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些知青作家,依据他们在“文革”

十年的经历与遭遇,创作了一批以高扬人的生命、尊严、价值与权利,揭批专制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各种陈规陋习,凸显历史与悲剧意识的小说,这些作品后来被人们称为“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其代表作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张贤亮的《灵与肉》、卢新华的《伤痕》、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与“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有关并且带来极大社会反响的电影,如《苦恋》、《戴手铐的旅客》、《巴山夜雨》、《征途》、《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庐山恋》以及《芙蓉镇》等。

这一时期,那些高扬自由、反省生命、讴歌人性的外国文学作品,诸如薄伽丘的《十日谈》、歌德的《浮士德》、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同样受到追捧,反映人道主义的经典文学作品,一时间洛阳纸贵。

80年代也是诗歌的时代(这再一次印证了那一年代的理想主义性质)。“五四”以来的各种新诗流派被重新发掘诗歌创作富于生机,以朦胧诗、“归来者诗”与现代主义诗作为主题。这一时期的诗歌爱好者也十分普遍。《诗刊》在当时发行上百万份,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哲学界则开始展开人性、异化与人道主义的理论探讨。王若水、王元化(王元化在80年代末创办的一份刊物的名字就是《新启蒙》)以及高尔泰等一批思想家充当启蒙主将。人们认识到,人道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同样是一种人道主义,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除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外,还存在一般的和超阶级的普遍的人道主义,认识论的对象,不只是客观对象,而且是人,即使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也须纳入对人的认识中方才呈现其实践意义。因此在先前确定为抽象的人性

论的背后,还存在着值得深入挖掘的人性根源。而且,社会主义同样存在异化,这直接为人们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反思“文革”提供了一种理论的可能性。在讨论中,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人们意识到,先前仅仅在无产阶级革命意义上传播的马克思学说还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全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开启了后来马克思学说的学术研究路向。上述思想在今天已属老套,但在当时却具有巨大的思想启蒙意义;但因为与官方口径不完全一致,这一思想随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被树作典型,并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表现。

1983年,胡乔木发表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实际上是官方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介入。但这篇文章不仅没有堵塞、反而深化了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探索。事实上,胡乔木专业性的论述直接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有关人性及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入研究——这当然也与业已形成的开放的学术研究氛围有关。在80年代中期以后,李泽厚、王元化、高尔泰、刘再复等一批知名学者以及甘阳等一批青年学人,把这一主题在美学以及文艺理论领域推展开来,高扬主体性,并形成了一批对当时思想文化界发生重要影响的作品。随后,李泽厚、高清海以及一大批中青年哲学学者,则在人、实践、主体性以及思维方式等哲学层面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使得新启蒙思潮的成果在学术传统中进一步扎下根来。甚至可以说,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由马克思哲学研究界扩展开来的诸多领域,如人学、实践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生存哲学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从属于新启蒙思想,是新启蒙思潮在学术上的后续表现。

新启蒙思潮最为直接地影响着哲学理论界。其入口是美学领域,其中又以主体主义美学的兴起为突破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老一代美学家朱光潜再次提出人道主义问题,并得到